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 (A刊) 核心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全文版) 收录期刊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A)

2026. 3

VOL.19 NO.3

公共行政 评论

JPA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

(A刊)核心期刊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收录期刊

6月15日出版

2026年第3期 总第111期

●专栏：公共管理的本土实践与机制创新

“赛马机制”：一种中国特色的科层组织间竞争性激励模式

..... 李风山 1

“新提法”何以解码：政策内容再生产的组织机制

..... 康健 张浅 陈诗琪 22

政策“先行先试”何以走向“升级再试”：基于创新街区建设的案例研究

..... 孟凡蓉 方泽贤 张天伦 41

“例外”何以嵌入“常规”：政策试点运行中的双重调适机制

..... 李海林 61

构建“绩责共同体”：应急管理部门推动自然灾害数据共享的协同策略

与运作逻辑 薛金刚 王晓曼 81

● 论文

韧性：政治信任的一个新维度

..... 吕书鹏 钱琛 李聪 101

延迟退休、个人选择与职工医保基金可持续

..... 高和荣 李松林 116

纵向干预驱动下的基层“适应性联合”执行策略：基于 A 县生态环境治理的
案例分析

刘莎莎 戴胜利 杨斌 138

税制结构与政府回应性：基于跨国数据的检验

..... 孙梓越 158

● 理论综述

从繁文缛节复归有效规则：制度规则研究的演进逻辑

..... 郭晟豪 魏雪 177

● 英文目录与摘要 196

政策“先行先试”何以走向“升级再试”： 基于创新街区建设的案例研究

孟凡蓉 方泽贤 张天伦*

【摘要】改革步入深水区之际，自主探索如何融合顶层设计是政策试验的重要议题。X市B区创新街区建设为该议题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案例。基于政策试验和提级治理相关研究，论文构建政策“先行先试”走向“升级再试”的分析框架，探寻政策“先行先试”走向“升级再试”的生成过程及试验逻辑。研究发现，政策“先行先试”衍生的棘手问题是政策“升级再试”的触发动因，试验方合法性动员和非试验方高位推动加速政策“升级再试”的进程，试验问题契合中央关切、“先行先试”取得良好绩效且试验方具备纵深探索的资源禀赋是政策“升级再试”的关键。政策“先行先试”走向“升级再试”的本质是自主探索的试错逻辑融合顶层设计的试对逻辑，二者形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试验合力。论文提出政策“升级再试”的概念及分析框架，不仅拓展了政策试验理论相关研究，也为改革深水区的政策试验提供了实践参考。

【关键词】政策试验 先行先试 升级再试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486 (2026) 03-0041-20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政策试验作为不确定情境下改进政策制定的治理安排，是解码“中国之治”

* 孟凡蓉，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通讯作者：方泽贤，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天伦，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及《公共行政评论》青年学者论坛点评专家的修改建议。

基金项目：西安交通大学“创新团队”专项研究课题“科技创新与区域发展政策”（2025GZDZ02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24ZDA028）。

的重要切口。通过在局部范围内实施新政策和深化新认知，政策试验推动治理知识向更大范围扩散以提升制度适应性。然而，伴随改革步入深水区，政策试验转向深层次和系统性探索，顶层设计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式（吕炜等，2019）。与此同时，试验一线的基层政府愈发面临权限约束问题，其发起的政策试验更多表现为对既定程序的提炼和改进（Mei & Liu, 2014），难以触及体制机制层面的深层次突破，如何实现顶层设计融合自主探索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

面对上述困境，政策“升级再试”提供新的回应思路。与以往局部试验取得成功上升为国家级政策不同，基层自发启动的部分政策试验在运行至特定阶段后，被上级或中央纳入国家战略体系，通过提升试验层级、扩大试验权限等方式推动其开展纵深探索。从“地方性探索”向“国家级赋权”跃迁的试验升级现象不仅是试验形态的重要转变，更可能预示试验逻辑的深层次变革。政策“升级再试”既保留基层自主探索的灵活性，又赋予试验工作权威性与系统性，为基层在改革深水区“啃硬骨头”和“渡险滩”提供新的治理路径。

尽管政策试验研究已数不胜数，但大多聚焦于自上而下的设计试验或自下而上的自发探索，在上下互动或横向平级扩散中忽视了纵向维度的试验层级跃升。部分研究从问题“模糊性”和“显著性”划分政策试验的升级类型（Song & Li, 2024），但未揭示政策“升级再试”的生成过程及行为逻辑。政策“先行先试”缘何走向“升级再试”？层级提升又反映何种政策试验逻辑？上述问题在现有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回应。由此，论文围绕 X 市 B 区国家级创新街区的政策试验历程，运用案例研究法分析政策“先行先试”走向“升级再试”的生成过程及试验逻辑。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一）文献回顾

1. 政策试验

依据核心导向，政策试验分为政策实验与政策试点两大类型（杨宏山、张健培，2023）。前者通过筛选随机样本、严格控制变量等方式，精准识别政策干预的净因果效应；后者以“先行先试”为特征，在局部探索获得反馈后校准方向，实现全局适应性治理。总体来看，学界对政策试验更多关注其治理导向，在试验主体、试验过程和试验结果等构成要件上形成一系列研究成果。

以党的十八大为分水岭，政策试验主体从中央主导的设计试验和地方发起的自主探索转向“自主探索”“设计试验”和“请示授权”三者并存的局面（张文显等，2018）。探索试验针对共性制度安排无法解决的差异问题，由地方自主探索新的政策工具，取得成功后扩散为区域性或全国性政策规范。设计试验则是中央

预设较为明确的试验目标，授权部分地区开展试点进行系统性验证。地方在试验中需遵循既定框架，同时细化实施方案，确保政策既符合国家整体战略要求，又能适应不同地区的发展需要（丰雷、胡依洁，2021）。此外，伴随顶层设计日益强化，“请示授权”成为政策试验方式的重要补充，地方政府在设计出试验方案后先请示高层政府，在获得正式确认并授权后才付诸实践，由此成为顶层设计联结地方探索的重要方式（郁建兴、黄飏，2017）。

政策试验通常由地方实施，而中央始终维持政治秩序、把控改革方向（刘培伟，2010）。这种把控体现在协调推进政策试验的各阶段（丰雷、胡依洁，2021）。Heilmann（2008）指出，中国的政策试验绝非地方放任自流或随心所欲扩大范围的反复试验，而是中央通过分散试验和适时干预的方式赋予制度适应能力的过程。在分级框架下，地方形成了累积有效性以提升试验合规性（郑永君、张大维，2016）、迭代学习和反馈（He et al., 2022）等策略行为，形成“中央选择性控制—地方策略性回应”的互动模式。

就结果而言，部分政策试验成功后被全局推广，一部分则因缺乏代表性而导致政策试验不可持续（Wang & Yang, 2025）。此外，实践中还存在“嵌套试验”“以面带点”等多种试验结果（李晓方等，2017；李晓飞、崔月，2024）。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除了试点属性外，还包括试错逻辑和试对逻辑的交互作用。试错逻辑偏重循证决策，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方案，评估者依据试验结果识别有效的政策安排；试对逻辑则预设较为明确的待检验假设，旨在验证新方向和提升政策公信力。但政策试验既不是漫无目的的试错，也不是先入为主的试对，而是中央主导下的政策求解过程（梅赐琪等，2015）。

2. 提级治理

目前，学界对于提级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核心内涵、驱动因素及运作过程等方面。

核心内涵方面，区别于向下逐级发包治理任务的科层运作方式，提级治理本质上是调适纵向权责关系，将超越个体或组织职权范围和能力限度的复杂问题从基层纳入高层以整合资源、寻求有效方案的过程（何艳玲、蒋良竹，2025）。需要提级治理的问题大多具有跨领域综合交叉、涉及多层级部门等棘手属性，问题驱动成为提级治理的重要动因（许玉镇、王光臣，2024）。

在问题驱动下，逆向动员和高位推动构成提级治理的运作过程。逆向动员方面，由于政府间职能和机构设置高度统一，纵向统合的“条”具备向下传输压力和加码压力的结构性通道，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块”的自主性发挥，基层面临事务下压和责任兜底的困境（朱光磊、张志红，2024）。此时，“首长站台”和“领导挂帅”等治理方式为基层无法独立解决的问题提供了梯次向上化解渠道。通过向上传导治理任务，逆向动员有助于缓解基层任务分配和能力资源之间的失衡关

系，确保治理压力稳定可控（郝本良、王印红，2024）。高位推动方面，面对同级部门因权力分散、利益分化等因素产生的制度性集体行动问题，高层党政领导将部分条线目标提级为多部门的共同目标或全局目标，有助于跨部门横向协调取得积极成效（王伟进、向静林，2024）。在逆向动员和高位推动下，议题由基层抬升至高层并在特定层级接受、认可后成为缓解府际张力、改善府际协同和形成府际调适网络的治理手段（臧雷振、张冰倩，2023）。

综上，面向政策试验和提级治理的研究已非常丰富，但对政策“升级再试”的探究尚显不足。一是没有溯及政策“升级再试”的前置因素。关于政策反复试验、嵌套试验等问题的既有研究，虽然关注到不同层级间政府对一项政策展开多轮试验的现象，但多集中在横向平级层面，无法解释一项政策缘何在纵向层面由低层级跃迁至高层级开展再试验的内在机理，还需深入分析触发政策“升级再试”的因素。二是缺乏央地关系在政策“升级再试”中的互动探讨。既有研究形成“中央选择性控制—地方策略性回应”的互动模式，但未进一步揭示不同层级政府如何通过逆向动员、高位推动的方式促成政策“升级再试”，政策“升级再试”的过程“黑箱”亟待被打开。三是忽视政策“试对”与“试错”结果良性转化的可能。多数研究认为，政策不是“试对”即为“试错”。然而，政策试验既不是一味试错耗费成本，也不是一贯进行有远见的试对。现实中，除了试错转向试对逻辑所导致的盆景化试验（冯川，2024）等消极结果外，试错和试对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尚待进一步探究。

（二）分析框架

1. 概念界定

综合政策试验和提级治理相关研究，本文将政策“升级再试”^①界定为基层政府为回应“先行先试”过程中出现的棘手问题，将试验议题逆向提至高层，经由高层接受认可后提升政策试验规格开展再试验的行为。可以看出，政策“升级再试”位于“先行先试”之后，是对前期试验的拓展与完善。进一步而言，政策“升级再试”在触发条件、主体关系、核心目标和时空范围等方面呈现其独特性。触发条件方面，政策“升级再试”既延续“先行先试”的问题导向，又直面改革深水区的棘手问题。这类问题往往突破基层的权限边界与能力水平，正需要政策“升级再试”发挥作用。主体关系方面，政策“升级再试”在纵向维度上构建起跨层级互动的试验合力。基层作为试验主体，在“先行先试”触及权限边界

^① “提级”“升级”和“升格”内涵相似，均指向对地方治理主体或治理事项进行级别提升或权力授予。为凸显政策试验的阶段性演进特征，本文在政策“先行先试”基础上提出政策“升级再试”概念。

后逆向动员高层介入，高层接受认可后下放权限，由此形成上下联动的试验合力。核心目标方面，政策“升级再试”的直接目标是应对“先行先试”遇到的棘手问题，深层目标是推动政策试验向更深层次拓展。时间范围方面，政策“升级再试”在政策“先行先试”基础上进行二次试验，形成前后衔接的递进阶段。空间范围方面，政策“升级再试”推动政策“先行先试”由基层治理空间拓展至更高层级、更广地域，试验方案将在治理情境更复杂、利益关联更多元的场景中接受检验，最终呈现时间迭代推进、空间梯度扩展的运作特点。

2. 框架建构

围绕政策“先行先试”何以走向政策“升级再试”这一研究问题，本文构建如图1所示的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将政策“升级再试”视作政策“先行先试”遭遇棘手问题后，经由“逆向动员—高位推动”产生的制度确认结果，这一结果有机融合自主探索与顶层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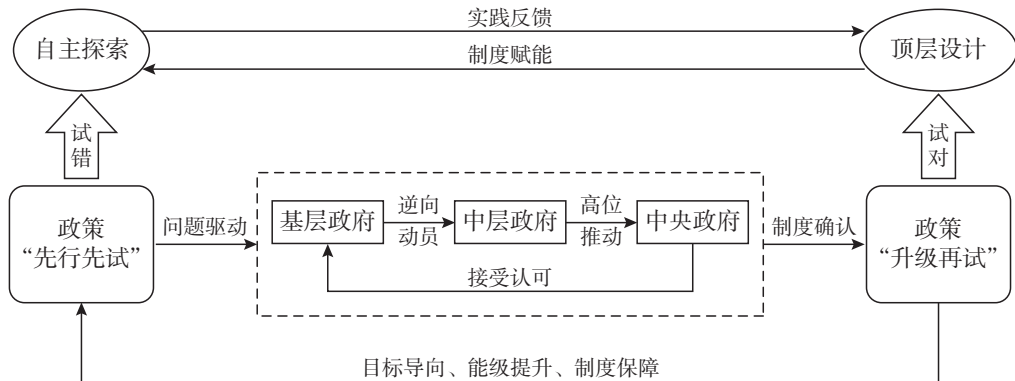


图1 政策“先行先试”走向“升级再试”的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政策试验是我国应对复杂问题和规避改革风险的有效手段。然而，当改革进入深水区，跨域性和复合化问题日益增多，涉及的行动空间、参与主体、投入资源和利益协调等事项逐渐超出“先行先试”的职能范围，迫切需要解决棘手问题，巩固和扩大政策试验的合法性。

面对“先行先试”中的棘手问题，基层扎实推进政策试验的同时，通过主动汇报试验进展、向上寻求政策支持等方式，逆向动员中层政府了解政策试验的动态与现实困境。作为连接基层和中央的关键枢纽，中层政府依托相对优势地位与资源禀赋，在自身职权范围内缓解试验问题，并高位推动政策“升级再试”。当试验议题与中央重点关注的问题领域、核心治理需求相契合，且已取得良好的试验绩效时，政策试验获得中央认可接受的概率将显著提升（石晋昕、杨宏山，2019）。制度确认后，政策试验进入“升级再试”阶段。“先行先试”方案也将嵌入国家发展战略体系，形成相关问题的中央层面目标（文宏、林彬，2020）。政

策“升级再试”通过配置战略目标、提高试验层级和制度保障等方式调整“先行先试”的方案，推动政策试验在更广阔范围和更复杂情境中开展深度探索。在此过程中，自主探索为顶层设计提供鲜活的实践反馈，顶层设计则通过制度赋能基层探索，二者良性互动，共同推动政策试验向纵深演化。

三、研究设计与案例呈现

（一）研究方法

案例通过呈现事件的因果机制和动态过程来产出理论知识（张静，2018）。在众多研究方法中，案例研究具有扎根本土和理论建构的比较优势而被视作讲好中国故事、回应中国之治的研究工具（侯志阳、张翔，2021）。其中，单案例研究关注研究情境和研究对象的互动细节，有助于识别事件的触发因素和运行机制，因此，本文采用单案例研究法分析政策“升级再试”的发生过程及运作逻辑。

1. 案例选取

基于典型性和契合性原则，本文选取 X 市 B 区^①创新街区建设作为研究案例。典型性方面，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4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X 市排名全球第 18 位，位列中国上榜集群第 7 位^②。B 区作为市辖区，在 23.37 平方千米辖区内汇聚了 17 所高校、10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 6 个国家工程技术中心，符合高校集聚型创新街区的建设要求。契合性方面，B 区在政策试验中历经区级创新产业带“先行先试”和国家级创新街区“升级再试”两个阶段，且在“先行先试”中遭遇棘手问题，不同层级政府在推动 B 区政策“升级再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契合本文分析框架。

2. 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文采用以一手资料为主、二手资料为辅的数据收集方法。一手资料包括实地调研的半结构化访谈记录、参与式观察结果、座谈会记录、工作人员提供的内部文件，以及会议材料等；二手资料主要是通过网络媒介收集的来自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和市级政府发布的政策文件、领导人讲话，以及会议精神等公开信息。为尽可能覆盖相关主体，研究团队分多个时段对 X 市 B 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以下简称“科工局”）负责人 W 局长、科技管理科（以下简称“科管科”）Q 科长、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L 副主任和 C 副主任、企业代表 C 经

① 按照学术研究惯例，本案例对所涉人名、地名均进行匿名化处理。

② 案例相关数据由访谈对象提供。下同。“全球百强创新集群”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自 2017 年起每年发布，原名“全球百强科技集群”。

理，以及产业带升级方案规划师 Z 教授进行访谈，征得同意后录音并编码整理，累计得到近 19 万字一手资料和 20 万字公开资料。

尽管无法获取中央层面的直接访谈数据，但本文通过“关键行动者+权威资料+三角验证”的数据处理策略，仍能保证案例分析的信度和效度。关键行动者方面，Z 教授深度参与 B 区产业带建设及国家级创新街区方案的规划工作，其因工作需要，对接中央、省、市科技部门，对其深度访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非试验方政府访谈数据缺失的问题。权威资料方面，创新街区申报相关工作多以线上形式推进，重大政策节点均有官方权威报道佐证，因而权威性资料能弥补田野调查的时空局限。本文重点搜集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以下简称“火炬中心”）、省科技厅、市科技局等政府部门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发布的领导讲话、政策解读文件和工作简报等一手数据，以此表征非试验方的政府视角；同时选取人民日报、S 省日报、X 市日报等覆盖中央、省、市各级的权威媒体报道，还原央地互动的关键节点。本文采用三角验证方式进一步提高信度和效度：采用“日期+被访者身份+核心主题”形式对一手资料进行编码处理，然后，将关键时间、事件和主体等信息与官方文件进行交叉核对，结合公开统计数据形成“实践活动访谈、官方文件佐证、统计数据支撑”的三角验证链条，当观点出现矛盾时则溯源原始凭证，优先采纳具有更高权威性的客观资料，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二）案例呈现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地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根本遵循。B 区作为老城区，辖区内集聚众多高校科研院所，却面临传统商业日趋衰落和多年无新增工业用地等发展困境。在上海环同济产业带的辐射带动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下，B 区于 2013 年联合 X 市科技局与 10 所驻区高校启动环大学创新产业带（以下简称“产业带”）建设。其间，B 区改造存量楼宇，建成 125 个双创载体，通过搭建创业孵化、技术转移等五大服务平台，率先在全省推出“创新创业券”等方式孵化中小企业，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2021 年，火炬中心启动创新街区建设工作，旨在放大创新创业集聚效应。同期，B 区产业带建设试验进入后期，逐渐暴露出政策势能不足、试验效能衰减等深层次问题。依托前期产业带建设的扎实基础和良好成效，在省市区三级政府协作下，B 区于 2022 年 6 月入选全国首批国家级创新街区，定位为高校集聚型创新街区。升级后的创新街区设立全省首个概念验证基金，搭建专业化概念验证平台，联合 14 家单位发起硬科技概念验证联盟。通过设立“双创”服务网点，B 区实现 189 项高频事项一站办理，以“微更新”模式激活存量空间，避免大拆大建的城市更新模式，成功探索出一条依托科教资源实现老城区创新发展的转型之路。

四、政策“先行先试”走向“升级再试”的过程分析

回顾案例可以发现，B区政策试验划分为建设区级产业带“先行先试”和建设国家级创新街区“升级再试”两大阶段。在前文分析框架基础上，本文从问题驱动和央地互动两方面分析政策得以实现“升级再试”的过程。为简化分析，本文将央地关系划分为以中央为代表的“试验发包方”、以S省、X市等中层政府为代表的“非试验方”和以B区基层政府为代表的政策“试验方”，分析“先行先试”走向“升级再试”的互动行为。

（一）问题驱动分析

政策试验始于现实治理需求。然而，B区在建设产业带“先行先试”中却面临政策势能不足、试验效能衰减的新问题。面对旧问题尚未解决、新问题接踵而至、新旧问题相互叠加的局面，B区及时调整初始试验方案。调整后的方案虽然提升了政策绩效，积累了政策实践经验，但囿于政策势能不足、试验效能衰减等问题超出B区的治理权限，新方案仅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上述困境。为避免试验进程中断，B区除了调整初始方案外，还需敏锐捕捉关键政策时机，促成政策“升级再试”。

1. 棘手问题产生

作为关键试验要素，政策势能是不同层级政府释放的政治信号强弱的表征。政策试验方只有具备与试验相关主体行动取向相匹配的政策势能才能持续推进试验。然而，受区级治理权限的约束，B区在与部属高校、市级政府等主体对接工作时存在势能不足的问题，制约了跨层级、跨领域的创新要素整合。辖区内两所院校分别隶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是副部级高校，行政级别不对等导致B区与高校间的联动层级有限，因而在科技项目跟踪、成效评估等方面的举措不足。

“跟部委直属级别的院校对接工作，最大的问题就是沟通，很多项目不可能说建就建，咱也不可能去跟校领导碰面，我们见的都是处室的副处长，他们又定不了事儿，有时候谈好的事说变就变了，在工作对接上不是太顺畅。”（访谈记录 20240915W）^①

作为老城区，B区以存量建成空间为主，多年来几乎无新增工业规划用地。这一固有属性既构成B区政策试验的前置性约束条件，也为产业带建设后期试验效能衰减埋下隐患。产业带建设初期，得益于高校外迁腾退了闲置校区，B区以优惠的地租和税收吸引了一批初创企业落地。然而，伴随企业规模的壮大和科创

^① 访谈资料编码规则为访谈时间+受访者姓氏首字母大写。

载体附加值的提升，叠加 X 市高新区、新区持续扩容和虹吸效应，B 区面临资本、项目和优质企业被周边地区分流的严峻挑战。不少在产业带培育壮大的中小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外迁，导致产业带建设试验的边际效益增速放缓。

“有些企业前期我们给予房租减免，项目给予扶持，好不容易把企业培养起来，（它们）一壮大就出去了。开始它们不需要厂房，几间办公室就能搞定，但到了上百上千人，（它们）肯定是要出去的，结果区里花一堆钱，企业没有任何税收贡献就走了，领导意见也比较大。”（访谈记录 20240915W、访谈记录 20240930C）

2. 调整初始方案

面对政策势能不足和试验效能衰减问题，B 区内外联动，多措并举调整试验方案。

针对势能不足的问题，B 区联合市编办依托 X 市政府办公厅在《关于支持 B 区环大学创新产业带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加大对产业带的政策支持力度。通过赋予 B 区产业带管委会相当于市一级的管理权限，建立产业带重点项目便利化审批机制。对产业带发展的重大事项，按照“一校一策”“一事一议”等方式组织实施，激发管委会、高校、企业等多方参与产业带建设的积极性。

针对效能衰减问题，B 区从硬件配套升级与“金融活水赋能”两方面优化原有试验方案。一方面，B 区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将符合棚户区改造条件的旧城和老旧家属区纳入 X 市重点项目，在不改变用地主体、符合政策法规的前提下优化规划事项，缓解存量空间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联合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和市财政局设立总规模不低于 5 亿元的基金集群，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吸纳社会资本，重点支持产业带与高等院所共建重大科创项目，注入多元资金缓解政策试验效能衰减的压力。

3. 捕捉机会之窗

多措并举下，产业带势能不足和试验效能衰减等问题得到一定缓解。然而，产业带要深度对接省级乃至全国的创新资源，巩固和拓展政策试验成果，借助高层政策势能、释放强劲品牌效应是必要条件。管委会工作人员也表示：“市区共建、区校联动的工作机制对开展工作肯定会有帮助，但如果进入‘国家队’（产业带升级为国家级创新街区），往后开展工作会更加方便，所以我们要努力去争取这块牌子。”（访谈记录 20240908C）此外，在老城区存量空间受约束的前提下，B 区也期待外部更有力的措施维系试验效能。

“吸引创业人才和科创企业，不能光靠低房租和宽敞的办公室……目前我们还有点信心，辖区内的交通优势和生活配套都比较方便。但是说实话，也有忧患意识，再不抓住（创新街区这个）机会，优势慢慢会被稀释掉。”（访谈记录 20250930C）

2022年4月,《2022年科技部火炬中心工作要点》提出:“完善创新街区试点方案,在重点城市建设特色化的创新街区。”由于创新街区围绕空间优化、园区产城融合和高校集聚等方向开展建设,其创新成果转化、创业企业孵化和“双创”载体优化等重点任务与产业带发展相关。因此,申请国家级创新街区成为B区应对棘手问题、推动政策试验升级的机会之窗。

(二) 央地互动分析

产业带要升级为国家级创新街区,还需要完成合法性建构,获得试验发包方的接受和认可。对此,政策试验方通过展示已取得的试验成效、对标国家战略等方式向上进行合法性动员,借助非试验方政府的高位推动作用,积极促成政策“升级再试”。

1. 政策试验方的合法性动员

火炬中心提出创新街区设想后,B区一方面成立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工作专班,组织多轮推进会完善创新街区实施方案与配套政策;另一方面,通过突出示范引领作用、对标国家战略等方式向上动员,以获得政策“升级再试”的合法性。

示范引领方面,B区在梳理国内外创新街区建设案例、区国土空间设计和高校校园规划的基础上,基于辖区科教资源密集的特点,瞄准“高校集聚型”街区定位,逐一走访签约的高校院所,划定创新街区的“四至”边界。此外,B区凝练前期产业带试验形成的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经验^①,对三项改革项目在产业带落地转化并创办企业的个体或组织,给予办公研发场地租金减免、投融资对接等政策支持,对重点项目给予最高200万元支持,不断巩固前期试验的成果。

对标国家战略方面,B区锚定国家“十四五”规划中前沿科技的发展导向^②,结合辖区内高等院校的专业优势,精准聚焦航空航天、智能制造等九大硬科技领域。此外,B区通过引育知名企业围绕上述方向在街区布局研发总部、区域研发中心等科创基地,建立与国际创新街区的知识产权合作,加速创新街区成为集聚创新资源的重要载体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抓手。

诚然,国家级创新街区的试验红利是B区不遗余力争取政策“升级再试”的动力,但政策试验也需要实现“以点促面、逐步推广”的目标。因此,B区政策

^① “三项改革”是指为破解科技成果转化中“不敢转、不想转、没钱转”的问题而实施的三项改革措施,分别是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技术转移人才职称评定、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出资转化。

^② “十四五”规划制定了包括新一代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和集成电路在内的7个科技前沿攻关领域。

“升级再试”的合法性除了高校密集的资源禀赋契合创新街区试验的定位外，也在于其能助力破解科技成果转化和老城更新等现实困境，积累治理经验。“创新街区试验并不是要打造一个一模一样的B区，而是其中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像‘三项改革’这样的经验可以推广。”（访谈记录 20251211Z）

2. 非政策试验方的高位推动

要实现政策“升级再试”还离不开非试验方政府的高位推动。X市和S省两级政府以密集的政策文件和行动措施，在资金供给和平台支撑上推动B区政策“升级再试”的实践进程。

在资金供给上，X市在十项重点工作中提出，依托产业带构建省市区三级联动的全域创新格局；市科技局协调将创新街区工作列入省市的“十四五”规划、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和政府工作报告等高规格文件中；市政府办公厅则统筹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出台关于支持科技创新街区建设的若干措施，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和项目进行政策扶持。“目前总共获得3000万元资助，一年给1000万元，连续支持3年。这1000万元对企业来说是能帮上忙的，因为我们是做孵化器的，是从‘0’到‘1’的过程。小企业，比如一个老师的团队，起步阶段可能二三十万就可以把这个台子搭起来，这个是很受益的，拿到这个钱后我们都是去支持企业、支持项目的。”（访谈记录 20240908C）

在平台支撑上，S省将产业带升级纳入省级创新平台QCY^①建设专项，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合力。借助QCY平台和产业带升级一体推进的工作契机，B区参照QCY相关政策与周边高校科研院所深入开展校地合作，通过整合大学内部闲置空间，先后启动科技园综合展厅和众创空间等立体联动孵化器建设，充实创新街区主体功能区。“我们可以借鉴QCY的政策，比如说对‘高企’的奖补，包括一些规划建设、如何在楼宇里面办企业……我们也提出要积极融入QCY总平台，创新街区应该是科技回归老城区，我们也应该借人家的‘东风’去做自己的事情（升级为国家级创新街区），这是正向引导。”（访谈记录 20240908Q）

省市政府作为非试验方，为何愿意高位推动产业带升级为国家级创新街区？其背后的行为动机是什么？从省市面临的具体现实问题来看，本文认为，利益共容是非试验方政府高位推动B区政策“升级再试”的关键，政策非试验方实际上扮演着政策“升级再试”的政策企业家角色。

作为直接领导B区的上一级政府，X市助推产业带升级，既可以减少先天基础薄弱、后发条件不足的地区的试验探索成本，也可以在同其他地市的横向创新

^① QCY是S省成立的创新驱动发展总平台。S省为加速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聚焦立体联动“孵化器”、成果转化“加速器”和两链融合“促进器”三大目标，打造科技创新的大平台。

竞争中脱颖而出。“当时跟 H 省高新区还有市高新区同时申报创新街区，市里觉得 B 区更有代表性，虽然 B 区产值或者企业量级可能不如高新区，但是刚好契合国家想做的一些点，例如，老城区旧城改造、科技成果转化可能有能借鉴的经验。”（访谈记录 20240930C）通过支持 B 区产业带升级，X 市避免试验名额旁落他市。此外，由于老城改造存在正外部性，X 市老旧的楼宇和低效的商业厂房也顺势改造为孵化器和概念验证平台，城市空间布局得以进一步优化。

对 S 省而言，QCY 作为全省创新驱动发展的总平台，其建设目标与产业带升级后的发展方向高度契合，二者均以整合全省科教资源、促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为核心目标。因此，S 省助推 B 区产业带升级，一方面能发挥 QCY 平台的引领作用，B 区可以依托 QCY 已建成的科创载体设施、成型的政策体系等成熟条件发展，减少 B 区的改革试验成本；另一方面，升级后的创新街区可以与 QCY 产生联动，进一步集聚高端创新要素，有助于破解 S 省长期存在的科技成果转化难题。

3. 试验发包方的接受认可

政策“升级再试”的关键在于试验发包方政府的接受和认可。既有研究表明，地方试验与中央关注的问题领域契合度较高且取得良好绩效时，政策试验更容易得到中央认可（石晋昕、杨宏山，2019）。

从问题契合度来看，B 区产业带建设始终锚定中央科技创新的战略部署。在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国务院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背景下，B 区立足科教资源富集优势，率先启动产业带建设，通过盘活老城区存量资源、搭建产学研融合平台，在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生态培育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6〕35 号）明确提出：“依托双创资源集聚的区域、高校和科研院所……探索形成不同类型的示范模式。”B 区打造高校聚集型创新街区正是对上述要求以及火炬中心创新街区试验方案的精准响应。此外，创新街区重点布局航空航天、智能制造等硬科技领域，契合“十四五”规划对前沿科技领域的划定。由此可见，领域高度契合成为 B 区政策“升级再试”的重要前提，省市等非试验方政府的高位推动则从侧面多重验证了政策“升级再试”方案的可行性，进一步展示了创新街区的建设蓝图。

此外，B 区具备纵深探索的资源禀赋，试验方案具备较强的复制潜力也是政策“升级再试”的关键所在。自 2013 年启动产业带建设以来，B 区已建成 13 个国家级“双创”载体，累计培育企业 2350 家；加之辖区内拥有 17 所高校、10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存量资源，叠加科技成果转化领域的“三项改革”经验和“光机所模式”，B 区具备开展创新街区深度探索的资源基础和经验推广条件。在多方因素作用下，2022 年 6 月 10 日，B 区举办环大学硬科技创新街区建设启动大会，标志着产业带正式升级为国家级创新街区。

五、政策“先行先试”走向“升级再试”的试验逻辑分析

（一）政策“先行先试”：自主探索的试错逻辑

在我国，由于公共问题的复杂性、治理区域的异质性，统一的治理方案往往难以实现全域适配。因此，赋予基层相对自主的决策与行动空间，允许其在不偏离制度框架的前提下，针对特定问题开展“先行先试”显得尤为必要。政策“先行先试”的本质是自主探索的试错逻辑，通过实践、反馈、修正的路径，逐步探索治理的最优方案。面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B区在缺乏现成实践经验的情况下试行产业带建设，其试错逻辑体现在目标动态调整和工具组合配置两个方面。

1. 目标动态调整

产业带建设初期，B区曾将目标聚焦企业集聚，尝试通过整合物理空间吸引创新要素汇聚。然而，物理空间集聚并不必然带来创新驱动的化学反应，科技成果转化成效依旧不佳。这一实践反馈促使B区将试验重心从空间建设转向体制机制创新，在科技成果转化领域试行“三项改革”是对初期目标偏差的重要修正。针对科技成果转化长期存在的“不敢转”“不想转”“缺钱转”的普遍难题，B区试行“三项改革”措施。通过将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解决“不敢转”问题，运用技术转移人才评价和职称评定制度解决“不想转”问题，使用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出资科技成果转化解决“缺钱转”问题，B区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把高校沉淀的资产和职务成果转化为可交易股权、可融资资产和可落地场景，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宝贵经验。

2. 工具组合配置

除了目标动态调整，灵活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也是试错逻辑的体现。产业带建设并非依赖单一的行政命令或财政补贴方式，而是综合运用规划引导、平台搭建、公私合作等多种政策工具。例如，在推动校地合作方面，B区最初采用召开座谈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等形式，但效果并不显著。通过深入调研高校院所和科研人员的实际需求，B区推出办公研发场地租金优惠、投融资对接等更具针对性的一揽子政策，设立最高200万元的重点项目支持资金，这正是在实践中不断试错、优化政策工具的体现。通过比较不同工具的实施效果，B区筛选出有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举措。

总的来说，B区政策“先行先试”呈现失败和成功并存的结果。成功方面在于，产业带在全省最早建立“创新创业券”扶持机制，在X市最早发布“双创”行动计划，在全省第一个成立创投基金，“三项改革”效能初显，等等。一系列敢

为人先的试错举措使 B 区在产业带升级为国家级创新街区前，建成国家级“双创”载体/平台 13 个，15 家企业入选市级上市后备企业名单。可以说，B 区在创业孵化和成果转化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当然，其中也不乏环大学数据智能小镇因产业特色不足和建设进度落后而在 2020 年被移除出特色小镇名单等失败经历。总之，政策“先行先试”中，B 区自主探索的试错逻辑为老城区如何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可行的初步方案，为后续政策“升级再试”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政策“升级再试”：顶层设计的试对逻辑

相较于政策“先行先试”，政策“升级再试”面对的治理情境并非从零开始。在该阶段，基层已通过“先行先试”积累了解决问题的局部方案。然而，随着改革的推进，政策试验愈发强调顶层设计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先行先试”形成的局部方案急需通过“升级再试”进行系统化提炼和标准化规范。与政策“先行先试”自主探索的试错逻辑不同，政策“升级再试”更多体现为顶层设计的试对逻辑。这种试对逻辑不是指政策方案能一步到位，而是在国家战略引领下，通过明确目标导向、提升试验层级和提供制度保障等方式完善试验方案，将已被实践证明的局部经验置于更大范围进行深度探索，确保政策试验符合国家整体战略方向。

1. 国家战略引导

《2021 年科技部火炬中心工作要点》提出“在具备条件的城市街区、高校周边及国家高新区内，布局建设一批创新街区”的试验设想，火炬中心的系列举措释放了顶层设计的强烈信号。对照顶层设计的要求，B 区立足高校资源优势，在产业带 10 所驻区高校共建的基础上，拓展共建范围至 17 所驻区高校、131 家科研机构 and 10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在街区申报中突出高校集聚型试验类型。围绕创新街区重点试验任务，B 区以企业体系化培育、成果加速化流转和载体创新化运营为支撑，积极融入总体部署。以创业企业孵化为例，B 区构建“分层培育、精准赋能”的培育体系，通过建立科技企业培育库，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实施“登高、升规、晋位、上市”的科创企业梯度培育工程，针对性开展政策培训、项目申报指导等服务，回应创新街区建设顶层设计的要求。

2. 提升试验层级

政策“升级再试”后，B 区通过提升试验层级进一步化解势能不足、效能衰减等“先行先试”阶段存在的问题。势能不足方面，相较产业带市级联席会议和市区共建机制，创新街区构建了省市区三级联动和校地企共建的全域创新格局。其中，B 区委、区政府牵头成立 QCY 创新驱动平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暨创新街区工作专班，为省级工作与国家级创新街区战略精准对接提供组织保障。与此同时，立足创新街区服务需要，B 区整合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税务局等多

部门业务，对X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进行功能延伸，启动政务服务驿站运营。驿站涵盖企业开办、税务等189个事项，线上办或自助办比例达95%。通过线上自助办理和线下送服务上门等方式，B区深化与共建高校、企业的合作交流，确立了专题会议和“政府主导、规划引领、社会运作、企业实施”的运作方式，破解以往同部属高校对接不畅、创新主体分散的痛点。

“（对于工作开展）确实更便利一些，当时拿这块‘国字号招牌’的时候，省科技厅还有市长对这非常支持，省当时是直接把我们定为省级QCY的一个孵化基地。后续跟高校或者是科研院所对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认可我们的。”（访谈记录20250930C）

试验效能衰减方面，依托创新街区的政策支撑，B区成立省内首支概念验证基金，在概念验证先行、孵化基金跟进理念指导下，产业方先行承担技术在项目验证前的支出，验证成功后优先入股，达到资金反哺孵化的循环效果。针对企业外流现象，创新街区推行“总部经济”模式，即保留企业总部或研发业态在B区，具体生产业务外移，并与迁入地协商收入返还比例，平衡企业的发展需求与税收贡献。

“升级为创新街区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品牌效应，之前一直说产业带，现在X市一想到创新街区，甚至一想到街区，都会想到B区；另外还有辐射效应，大家知道创业要去B区，因为是国家级平台，靠得住。”（访谈记录20250930C）

3. 保障试验效能

在政策“升级再试”过程中，以“三项改革”为代表的科技成果转化经验通过制度保障进一步扩大影响。省科技厅明确将深化“三项改革”作为创新街区建设的核心抓手，推动试验主体从“先行先试”阶段的高等院校，逐步拓展至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等多元主体。在此基础上，结合前期试验反馈与需求优化，省科技厅联合六部门发布《S省深化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十条措施（试行）》和《关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科技强省的决定》，创造性地提出“先试用后付费”“权益让渡”等27项具体举措，构建起系统性的政策支撑体系。随着政策“升级再试”的持续深入，“三项改革”相关成果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被正式纳入S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成为地方性法规，试验成效在制度层面得以巩固。

（三）政策“先行先试”走向“升级再试”：自主探索融合顶层设计

政策“先行先试”走向“升级再试”指向自主探索融合顶层设计的政策试验逻辑，为复杂情境下国家治理如何保持渐进调适提供了新的路径。作为政策试验的关键维度，自主探索与顶层设计并非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在特定条件下相互支

撑、同向发力，最终形成国家治理的试验合力。

步入新时代，局部政策试验设计难以穷尽纷繁复杂的问题与差异化的全局情境。相较之下，政策“先行先试”转向“升级再试”的进阶模式构建了更为系统的治理框架。这一框架以局部自主探索为治理根基，通过边界控制和经验固化推动国家治理在复杂情境中渐进调适，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对改革规律的深刻把握。

在产业带建设阶段，尽管B区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其实践探索始终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展开，而非脱离制度轨道的盲目尝试。当试验进入政策“升级再试”阶段，顶层设计的适时引导确保创新街区在可控边界内朝着既定方向进行深化改革。这种边界可控性具备双重价值：一是为基层自主探索保留必要空间，避免过度约束导致基层活力流失；二是依托顶层设计的目标导向、资源配置和制度保障，巩固和推广成功经验，将优化后的试验方案置于更复杂的现实情境进行迭代、检验，最终在治理稳定性与变革创新性之间建立起渐进调适的动态平衡。在这过程中，自主探索与顶层设计并非孤立运作，而是形成有机整体。自主探索凭借其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和灵活的决策优势，为顶层设计提供方案基础与问题反馈；顶层设计则依托其全局视野和制度权威，为自主探索提供方向引领、制度保障与资源支撑。二者双向赋能、协同发力，共同推动政策试验在复杂情境中稳步前行。

六、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一）研究结论与讨论

基于产业带升级为国家级创新街区的实践案例，本文探究了政策“先行先试”走向“升级再试”的过程与试验逻辑。研究发现，政策“先行先试”中的棘手问题是驱动政策走向“升级再试”的重要动因，政策试验方的合法性动员和非试验方的高位推动，加速了政策“升级再试”的进程。当试验议题与中央关切契合度较高且取得良好绩效、试验方具备纵深探索的资源禀赋时，政策“升级再试”更有可能被接受认可。从试验逻辑上看，政策“先行先试”凸显自主探索的试错逻辑，承担提供局部方案的功能；政策“升级再试”则体现了顶层设计的试对逻辑，发挥全局方向的引领作用。政策从“先行先试”走向“升级再试”的本质是自主探索的试错逻辑融合顶层设计的试对逻辑，最终形成凝聚试验合力的国家治理机制。

本文主要有以下三点理论贡献。

其一，本文提出政策“升级再试”的概念及问题驱动的前置性因素，揭示了政策试验除水平层面的“试验-扩散”路径外，还存在纵向的层级跃迁路径，突破了既有政策试验研究的层级局限。政策反复试验、嵌套试验等研究虽聚焦不同

试验方政府在既定框架内对政策展开多轮试验的行为，但多停留在横向平级的层面。政策“升级再试”则强调试验方政府在政策“先行先试”遭遇棘手问题后，经由非试验方高位推动，获得中央接受认可，提升政策试验层级再度开展试验的行为。其不仅回应了“如何改进政策试验”的技术性问题，更回答了“是否需要改变试验层级”的权限性问题，为理解政策试验提供了纵向层级视角。

其二，本文刻画了“基层逆向动员—中层高位推动—中央接受认可”的政策“升级再试”全过程，为政策试验中的央地关系互动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既有研究将政策试验中的央地关系框定在“中央选择性控制—地方策略性回应”的一般过程中，基层多被定位为被动试验的主体，中层政府亦处在研究视野外，或被视作静态扩散主体。本文突破了既有分析框架，既凸显了中层政府在传递基层诉求、连接顶层设计中的枢纽作用，又彰显了基层为推动政策“升级再试”所展现的主观能动性与合法性建构行为，有力证实了政策试验中的央地关系双向互动逻辑。

其三，本文聚焦试错逻辑和试对逻辑在政策“先行先试”走向“升级再试”过程中的共同作用，回应自主探索如何融合顶层设计的政策试验命题，为改革深水区的政策试验推进提供了理论参照。区别于以往试错逻辑和试对逻辑截然对立，或试错逻辑转向试对逻辑引发盆景化试验等研究观点，本文发现，试错逻辑与试对逻辑并非线性替代关系，而是呈现阶段融合与递进的特征。政策“先行先试”以试错逻辑为主导，允许基层开展多元探索；待形成局部经验后，顶层设计的试对逻辑发挥主导作用，通过战略引领、层级提升和制度保障，将基层试错所形成的有效经验进行系统化提炼，推动其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并接受新的检验。这一过程有助于实现自主探索灵活性与顶层设计规范性的有机统一，既让政策试验保持创新活力，又确保其始终在全局方向上稳步推进。

（二）实践启示与展望

政策试验的本质在于实现成功经验的有组织积累，最终达到逐步推广的目的（冯川，2024）。然而，既有创新街区的研究揭示，对创新街区认知不足是制约其推广的重要因素（吴建南，2024）。因此，产业带升级为国家级创新街区后能否实现推广仍需进一步考察。从现实情况来看，受国家级创新街区示范的影响，S省其他地市开始试行环大学科技创新产业带建设，其中W区打造的环大学科技创新产业带最具代表性。借鉴B区集聚高校创新资源的成功经验，W区强化政校企协同，联合辖区6所高校建设科技成果转化中心，通过编制技术需求清单、成果认领清单、路演清单等方式，设立科技产业金融专项资金，一年多时间便实现100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新增51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印证了创新街区建设理念推广的可能性。

进一步从推广条件来看，B区与W区的成功离不开以下共性基础：一是两地均面临老城区空间受限、创新资源碎片化，以及存量建成区改造难度大等治理问

题；二是区域内密集的高校创新资源提供充足的政策试验支撑；三是地方政府具备较强的协作意识与资源整合能力。W区在省市级政府支持下出台14项科创专项政策，设立3亿元科技产业金融专项，该做法与B区政策试验升级时省市级政府的系列举措相似。两地产业发展与国家创新需求高度契合，均聚焦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广阔的验证场景，符合国家战略规划需要。因此，具备上述资源禀赋与良好政府协作环境的地区，创新街区相关经验做法更容易被复制推广，成功率也相对更高。

在未来，为更好促进政策试验复制推广，需要充分发挥顶层设计和自主探索上下联动的优势，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试验合力。在自主探索方面，基层作为试验前线，在具体实践中应被赋予更大的改革探索空间。一方面，鼓励基层围绕发展痛点和治理难点开展政策“先行先试”，通过建立容错纠错机制，明确容错清单和标准，提升政策试验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基层要及时总结和提炼“先行先试”经验，将行之有效的做法形成规范化报告，为顶层设计提供支撑。对于因治理权限约束而无法克服的棘手问题，应及时向上传递试验诉求，精准把握顶层设计方向，使局部探索能嵌入国家战略布局中。对于“先行先试”成效显著、契合国家战略且具备推广潜力的局部试验，顶层设计应及时介入，将其纳入政策“升级再试”范畴，推动其在更大范围内接受检验。具体可从三方面发力：第一，把握顶层设计介入的时机和方式。通过健全经验甄别机制，剔除个性化因素，杜绝政策试验升级的套利行为，在此基础上提炼核心做法，形成可复制模式。第二，提升资源配置层级。通过政策授权、搭建专项平台和资金调拨等方式，支持基层在更大范围和更高权限上开展政策试验，避免因资源不足而导致试验夭折。第三，建立动态评估与反馈机制。构建涵盖经济增长等显性绩效和制度创新等隐性绩效的评估体系，识别政策试验中的新问题。同时，畅通央地沟通渠道，鼓励基层提出优化建议，形成评估、反馈、调整的良性循环，确保政策“升级再试”兼顾战略定力与灵活适应性，实现从局部探索到全局引领的有效跨越。

本文仍存在局限。受资料限制，本文未能探讨B区政策“升级再试”后续的全局推广环节。此外，政策“升级再试”的实践不仅仅是创新发展议题，后续研究可通过多案例比较或政策评估等方式，进一步考察政策“升级再试”对政策全局推广所产生的影响，结合央地关系在顶层设计与自主探索中的互动作用，完善政策“先行先试—升级再试—复制推广”的理论链条。

参考文献

- 丰雷、胡依洁 (2021). 我国政策试点的中央政府行为逻辑探析——基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的案例研究. *中国行政管理*, (8): 138-145.
- Feng, L., & Hu, Y. J. (2021). The Logic of Central Government Behaviors in Contemporary China's Policy Pilots: A Case Study of China's Experimentation on the Three Land Reform.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8): 138-145. (in

- Chinese)
- 冯川 (2024). 试点政策的可错性与可推广性——一个关于政策试验“盆景化”的解释框架. *政治学研究*, (2): 206-219+263.
- Feng, C. (2024). The Fallibility and Extensibility of Policy: A Framework for Explaining Why Policy Experiments Evolve into Bonsai. *CASS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 206-219. (in Chinese)
- 郝本良、王印红 (2024). 面向纵向治理平衡：国家治理体制中的一体两面——基于领导包联制的分析. *政治学研究*, (5): 137-154+168.
- Hao, B. L., & Wang, Y. H. (2024). Balance for Vertical Governance: Two Aspect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alysis Based on Leadership Connection System. *CASS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 137-154+168. (in Chinese)
- 何艳玲、蒋良竹 (2025). 提级治理：跨层级协作何以解决城市历史遗留问题. *学海*, (2): 15-28+213.
- He, Y. L., & Jiang, L. Z. (2025). Upgraded Governance: How Authority-Driven Cross-Level Collaboration Address Urban Historical Legacy. *Academia Bimestris*, (2): 15-28+213. (in Chinese)
- 侯志阳、张翔 (2021). 作为方法的“中国”：构建中国情境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 *公共管理学报*, 18(4): 126-136+174.
- Hou, Z. Y., & Zhang, X. (2021). “China” as a Method: A Case Stud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ontext.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18(4): 126-136+174. (in Chinese)
- 李晓方、孟庆国、张楠 (2017). 嵌套试验与创新涌现：深圳市“织网工程”政策试点的过程分析.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5): 15-25+126.
- Li, X. F., Meng, Q. G., & Zhang, N. (2017). How Does Innovation Emerge from Policy Experiments: A Case Study from Shenzhen's Netting Project. *Journal of Gan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5): 15-25+126. (in Chinese)
- 李晓飞、崔月 (2024). 以面带点：政策试点中地方政府政绩互补的实现机制——以M县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试点为观察对象. *公共管理学报*, 21(3): 124-136+174.
- Li, X. F., & Cui Y. (2024). Integrating Area Experience to Promote Pilots: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Political Achievements Complementat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in Policy Pilots: A Case Study of the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 of Homestead” Pilot in M County.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21(3): 124-136+174. (in Chinese)
- 刘培伟 (2010). 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 *开放时代*, (4): 59-81.
- Liu, P. W. (2010). Experiments Based on Central Selective Control: A New Explanation for the Practice Mechanism of China's Reform. *Open Times*, (4): 59-81. (in Chinese)
- 吕炜、周佳音、陆毅 (2019). 理解央地财政博弈的新视角——来自地方债发还方式改革的证据. *中国社会科学*, (10): 134-159+206-207.
- Lü, W., Zhou, J. Y., & Lu, Y. (2019).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entral-Local Fiscal Game: Evidence from Reforms in the Issuance and Repayment Modes of Municipal Bond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0): 134-159+206-207. (in Chinese)
- 梅赐琪、汪笑男、廖露、刘志林 (2015). 政策试点的特征：基于《人民日报》1992—2003年试点报道的研究. *公共行政评论*, 8(3): 8-24+202.
- Mei, C. Q., Wang, X. N., Liao, L. & Liu, Z. L. (2015). Patterns of “Experimentation Point”: Evidence from People's Daily's 1992—2003 Reports on Policy Experimentation Point.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8(3): 8-24+202. (in Chinese)
- 石晋昕、杨宏山 (2019). 政策创新的“试验-认可”分析框架——基于央地关系视角的多案例研究. *中国行政管理*, (5): 84-89.
- Shi, J. X., & Yang, H. S. (2019). The Experiment-Recognition Framework of China's Policy Innovation: A Multi-Cas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entral-Local Governments' Relationship.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5): 84-89. (in Chinese)
- 王伟进、向静林 (2024). “条线工作升格”与多部门行动逻辑的重构——基于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案例分析.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61(3): 44-55+157.
- Wang, W. J., & Xiang, J. L. (2024). Making Vertical Management Streamlined in Work and Reconstructing Logic of Multiple-Department Action: A Case Analysis Based on “Integrating the Issue of Health into All Policies”.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1(3): 44-55+157. (in Chinese)
- 文宏、林彬 (2020). 国家战略嵌入地方发展：对竞争型府际合作的解释. *公共行政评论*, 13(2): 7-22+193.

- Wen, H., & Lin, B. (2020). National Strategy Embedded in Local Development: An Interpretation of Competitive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3(2): 7-22+193. (in Chinese)
- 吴建南 (2024). 以创新街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 59-65.
- Wu, J. N. (2024). The Practical Path of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ith Innovation Blocks. *Frontiers*, (20): 59-65. (in Chinese)
- 许玉镇、王光臣 (2024). 提级监督何以有效治理农村“微腐败”——基于多案例的扎根理论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 (5): 110-119.
- Xu, Y. Z., & Wang, G. C. (2024). How Does Upgraded Supervision Effectively Govern Rural “Micro-corruption”? A Grounded Theory Study Based on Multiple Cases.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5): 110-119. (in Chinese)
- 杨宏山、张健培 (2023). 政策试点何以悬浮? 治理研究, 39(1): 68-80+158-159.
- Yang, H. S., & Zhang, J. P. (2023). How Does Policy Pilots Turn into Suspension: Based on Case Study of the Reform of Property Tax Pilots. *Governance Studies*, 39(1): 68-80+158-159. (in Chinese)
- 郝建兴、黄飏 (2017).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新进展——兼论纵向政府间关系的重构. *政治学研究*, (5): 88-103+127.
- Yu, J. X., & Huang, B. (2017). Mapping the Recent Progress of Local Government Innovation in China: Restructuring Vertical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hip. *CASS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 88-103+127. (in Chinese)
- 臧雷振、张冰倩 (2023). 行政升格如何调适府际关系——历史演进、学理类型与作用机制. *政治学研究*, (1): 83-95+158-159.
- Zang, L. Z., & Zhang, B. Q. (2023). How to Adjust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by Upgrading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Historical Evolution, Theoretical Types and Function Mechanism. *CASS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 83-95+158-159. (in Chinese)
- 张静 (2018). 案例分析的目标: 从故事到知识. *中国社会科学*, (8): 126-142+207.
- Zhang, J. (2018). The Goal of Case Analysis: From Story to Knowledg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8): 126-142+207. (in Chinese)
- 张文显、徐勇、何显明、姜晓萍、景跃进、郝建兴 (2018). 推进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建设,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治理研究*, 34(6): 5-16.
- Zhang, W. X., Xu, Y., He, X. M., Jiang, X. P., Jing, Y. J., & Yu, J. X. (2018). Promote the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of Autonomy, Rule of Law and Rule of Virtue, and Innovate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Governance Studies*, 34(6): 5-16. (in Chinese)
- 郝永君、张大维 (2016). 从地方经验到中央政策: 地方政府政策试验的过程研究——基于“合规-有效”框架的分析. *学术论坛*, 39(6): 40-43+130.
- Zheng, Y. J., & Zhang, D. W. (2016). From Local Experience to Central Policy: A Study on the Process of Local Government Policy Experimentation: Analysis Based on the “Compliance-Effectiveness” Framework. *Academic Forum*, 39(6): 40-43+130. (in Chinese)
- 朱光磊、张志红 (2024). 职责同构: 中国政府纵向职责配置的基本特征. *治理研究*, 40(06): 4-14+157+2.
- Zhu, G. L., & Zhang, Z. H. (2024). Isomorphic Responsibility: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Intergovernmental Vertical Responsibility Allocation. *Governance Studies*, 40(06): 4-14+157+2. (in Chinese)
- Heilmann, S. (2008). Policy Experimentation in China's Economic Ris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43(1): 1-26.
- He, A. J. W., Fan, Y. M., & Su, R. (2022). Seeking Policy Solutions in a Complex System: Experimentalist Governance in China's Healthcare Reform. *Policy Sciences*, 55(4): 755-776.
- Mei, C. Q., & Liu, Z. L. (2014). Experiment-based Policy Making Or Conscious Policy Design? The Case of Urban Housing Reform in China. *Policy Sciences*, 47(3): 321-337.
- Song, Y. P., & Li, Y. W. (2024). Upscaling Policy Pilots: Four Tales in Chinese Health Governance.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0(0): 1-21.
- Wang, S. D., & Yang, D. Y. (2025). Policy Experimentation in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Learn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33(7): 2180-2228.

责任编辑: 叶林

英文目录与摘要

JPA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19 No. 3, 2026

●SYMPOSIUM: Local Practice and Structural Innov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Horse-Racing Mechanism”: A Distinctive Competitive Incentive Model in Chinese Bureaucracy

..... Fengshan Li

Abstract The horse-racing mechanism, a governance term more frequently practiced than theorized, offers a novel lens for understanding competitive incentives within bureaucratic systems. Rather than keeping performance confined to “internal ledgers,” the mechanism externalizes outcomes into public rankings, rendering performance management more visible, sequenc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This process generates enduring comparative pressure and dynamic incentives among peer organizations. Building on the theory of the “Pressure-Based System,” this study develops an organizationalized pressure-circulation model and applies it to the case of Z City’s business environment reform.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local governments’ “races” follow a cyclical process: arena setting (defining competition goals), track delineation (standardizing competition rules), process contestation (sustaining competitive pressure), and outcome evaluation (consolidating results and rewards). At the operational level, the mechanism works through institutionalized pressurization, differentiated stabilization, procedural regulation, and result-oriented release, enabling the dynamic transmission and continuous transformation of organizational pressure. By elevating the horse-racing mechanism from colloquial usage to a systematic theoretical construct, this article contribute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style competitive governance.” It refines the explanatory scope of “Pressure-Based System” in the Chinese context, enriches localized interpretations of competitive incentives in the public sector.

Key Words Horse-Racing Mechanism; Competitive Incentives; Bureaucracy; Pressure-Based System; Performance Management

How to Decode “New Formulations”: The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of Policy Reproduction

..... Jian Kang, Qian Zhang & Shiqi Chen

Abstract “New formulations” often appear in the form of new expressions, new assertions, new terminologies, or guiding opinions on a particular policy issue, and are a common phenomenon in China’s policy process. Given the diverse policy environments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in China, decoding “new formulations” through policy reproduc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procedures for policy formulation to adapt to regional development. Existing research primarily focuses on the extent, motivatio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licy reproduction, leaving the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of policy reproduction as a theoretical issue that urgently needs to be addressed. This study introduces a case study of District J in Chengdu, which formulated a work plan to strengthen the basic functions of the city, to provide an in-depth description of the process of policy reproduction from the “new formulation” of “urban function optimization” in Chengdu to its decoding and the subsequent issuance of the policy plan in District J. Based on the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heory, the analysis finds that policy reproduction relies on three mechanisms: organizational foundation, external intellectual support, and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 Specifically, the working task force embedded in the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 and oriented toward temporary tasks serves as the organizational foundation for policy reproduction; expert participation acts as

the external intellectual support; and the allocation of attention among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s constitutes the mechanism of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 These findings attempt to explain the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of policy reproduction from a process perspective, providing a new lens for analyzing policy reproduction.

Key Words Policy Reproduction;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Working Task Force; Attention Allocation; Expert Participation

How Can Policy Move from “Initial Piloting” to “Upgraded Re-experiment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Innovative Block Construction Fanrong Meng, Zexian Fang & Tianlun Zhang

Abstract As reform enters deeper waters, how to integrate bottom-up independent exploration with top-level design has become a critical issue in policy experiment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novative block in District B of City X provides a vivid practical case. Drawing on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policy experimentation and upgraded governanc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transition from policy “initial piloting” to policy “upgraded re-experimentation”, exploring the generative process and experimental logic. The result reveals that wicked problems arising from policy “initial piloting” serve as the trigger for policy “upgraded re-experimentation”; the legitimacy mobilization by experimental actors and high-level promotion by non-experimental actors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policy upgrading. The key conditions for policy “upgraded re-experimentation” include alignment of experimental issues with central government concerns, satisfactory performance of initial pilots,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resources for in-depth exploration by experimental actors. The transition from policy “initial piloting” to “upgraded re-experimentation” essentially reflect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rial-and-error logic of bottom-up exploration with the validation logic of top-level design, which together generate synergistic experimental force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By proposing the concept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policy “upgraded re-experimentation”, this paper not only expands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policy experimentation but also offer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experimentation in the deepening stage of reform.

Key Words Policy Experimentation; Initial Piloting; Upgraded Re-experimentation

How Do “Exceptions” Become Embedded in “Routine”: A Dual Adaptation Mechanism in the Operation of Policy Pilots Hailin Li

Abstract How do policy pilots, which are often introduced as “departures from routine”, continue to operate within bureaucratic hierarchies? Existing accounts are typically separated into three perspectives—authority, resources and incentives, and learning—and they often treat pilots as a special form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without fully examining how bureaucratic arrangements are reshaped in the process. Drawing on structuration theory, this article develops a dual-adaptation framework consisting of policy adapt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adaptation,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vertical intergovernmental interactions.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the “Four-Excellence Community” pilot,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sustained operation of policy pilots depends on the joint adaptation of policy and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 Together, they ease tensions between experimentation and bureaucratic routines along the dimensions of legitimacy, domination, and signification. Specifically, policy adaptation involves the ongoing adjustment of policy goals and content,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and policy knowledge. These adjustments provide direction and enable breakthroughs in experimental practice. Organizational adaptation reconfigures authority-responsibility relations, reallocates resources, and builds arenas for learning, thereby furnishing an enduring organizational basis for implementation. The two forms of adaptation work through a division of labor characterized by “flexible steering” and “stable anchoring”, as well as a coupling between

“mobilizing and leveraging” and “maintaining and safeguarding”. In doing so, they facilitate the institutionalized embedding of pilots into bureaucratic routines and enable the orderly generation and diffusion of innovative practices. This article offers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for explaining how policy pilots become routinized within bureaucratic systems and advances a “change-and-continuity” perspective on policy piloting as a governance mechanism.

Key Words Policy Pilots; Bureaucratic System; Policy Adaptation; Organizational Adaptation;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Constructing Performance-Responsibility Community: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Department Promotes Collaborative Strategies and Operational Logic in Natural Disaster Data Sharing

..... Jingang Xue & Xiaoman Wang

Abstract Natural disaster data sharing is a crucial foundation for effective emergency management. Existing research has primarily focused on general data sharing led by government data governance agencies. How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department, as the leading department for emergency collaboration, promotes natural disaster data sharing remains to be thoroughly explored. Based on the case of natural disaster data sharing in District A, following the framework of “task attributes-collaborative strategies-operational logic”,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llaborative strategies and operational logic adopted by emergency management departments in promoting the sharing of natural disaster data. The study finds that in natural disaster data sharing, there is a diminishing utility of bureaucratic pressure transmission, and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department has changed from affiliated collaboration to performance-responsibility community collaborative strateg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shared beliefs. By respecting the autonomy and operating space of various departments,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department effectively achieves data sharing through task desensitization logic,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logic and value reinforcement logic. This study enhances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build a “performance-responsibility community” in data sharing led by functional departments and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inter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Key Words Performance-Responsibility Community; Emergency Management Department; Natural Disaster Data Sharing; Collaborative Strategies; Operation Logic

●ARTICLES

Resilience: A New Dimension of Political Trust Shupeng Lü, Chen Qian & Cong Li

Abstract Political trust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The vast majority of current literature on political trust has defaulted to it as a one-dimensional variable, focusing exclusively on its “level”. These studies ignore another important dimension of political trust: a degree of “stability” in the face of shocks, or more accurately described as the “resilience” of trust.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and the theory of resilienc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formulate the academic concept of “resilience of political trust” and defines it as “the ability of citizens’ political trust to remain unchanged or quickly recover to its original level after experiencing complex and diverse shocks and disturbances”. The resilience of political trust is essentially a reflection of the dynamic proces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xternal shocks and individual psychology.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mainly include the mechanism of trust generation, the object of trust,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the stock of individual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the experience of individu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or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a high resilience of political trust may be more meaningful than a mere high level of political trust. This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resilience of political trust is able to avoid a rapid loss of political trust and maintain it at

an acceptable level of social stability and political security in the event of shocks and disturbances, thus enabling the political system to gain extra room for maneuver in the event of policy mistakes and administrative blunders. In addition, this study proposes a two-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level-resilience”. Based on this framework, this study categorizes citizens into four types and elucidates the political attribut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type along with their underlying poli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Political Trust; Resilience; Resilience of Political Trust; Government Trust; Political Legitimacy

Delayed Retirement, Individual Choice,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Employee Medical Insurance Fund
..... Herong Gao & Songlin Li

Abstract Enhanc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social insurance funds is a key issu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and the policy of delayed retirement is a direct response to this issue. Previous studies on delayed retirement have paid greater attention to its impact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pension funds, while comparatively neglecting its impact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medical insurance funds. At the same time, the gradually implemented delayed retirement policy explicitly emphasizes that employees’ intentions must not be violated, which means that the effects of delayed retirement depend not only on institutional design itself, but also on employees’ behavioral responses. In light of this, this paper incorporates “individual choice” into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urban employee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fund and examines the impact of delayed retirement on the fu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performance. The findings show that delayed retirement can effectively postpone the year in which the employee medical insurance fund first falls into deficit, but “individual choice” imposes a certain degree of erosion on policy effectiveness.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merge in both the implement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delayed retirement policy and the behavioral losses associated with it. Overall, the governance paths corresponding to the social and policy dimensions are mor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fund sustainability than the exogenous constraints represented by the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dimensions. On this basis, delayed retirement and individual choice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framework for the employee medical insurance fund, so as to enhance the behavioral adaptability of the delayed retirement policy, optimize the combination of policy instruments under the trade-off between “effectiveness” and “robustness,” and improve a dynamic evaluation mechanism oriented toward real behavioral environments.

Key Words Delayed Retirement; Individual Choice;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Medical Insurance Fund

The Grassroots Adaptive Coalition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Driven by Hierarchical Intervention: A Case Study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County A
..... Shasha Liu, Shengli Dai & Bin Yang

Abstract Cross-departmental coalition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serves as a key window to understand the logic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Within China’s multi-level governance system, how is such inter-agency coalition effectively driven, and why does it exhibit differentiate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This remains a key issue awaiting in-depth exploration. Integrating theories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this paper develop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hierarchical intervention-interdepartmental interdependence-coalition implementation.” By mapping the attributes of intervention instruments against the nature of interdepartmental interdependence, the framework deduces four types of coalition implementation: regulatory balancing, directive affiliation, mobilization-based reciprocity, and patchwork excellence-seeking. Through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fou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itiatives in County A, province S, the study finds that grassroots governments do not merely implement top-down directives passively in complex tasks. Instead, they strategically convert the political pressure or incentive potential embedded in hierarchical intervention into horizontal collaborative momentum, thereby forming an adaptive mode of joint implementation. This mechanism of “adaptive coalition” encompasses both institutionalized and emergency collaboration driven by control-oriented interventions, as well as flexible and selective collaboration shaped by incentive-based interventions. It systematically reveals the internal process and continuous spectrum of the “vertical-driving-horizontal” logic of collabor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Key Words Coalition Implementation; Hierarchical Intervention; Interdepartmental Interdependence; Adaptive Coalition; Collaboration Logic

Tax Structure and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Empirical Tests Based on Cross-nation Data

..... Ziyue Sun

Abstract The fiscal system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modern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Constructing a modern fiscal system and optimizing the tax structure are crucial for enhancing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and upgrading governance quality.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of direct and indirect taxes on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within the context of tax structure division, and utilizes cross-national data from 2003 to 2020 to ve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es in taxation and tax structure and indicators of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The study finds that taxation can improve the level of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and countries that are highly dependent on taxation in terms of finance have a higher responsiveness to citizens’ demands and are more likely to achieve good governance; there is a directional difference in the impact of direct and indirect taxes on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Specifically, an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indirect taxes in tax revenue hinder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whereas a higher proportion of direct taxes can notably enhance it, albeit with a slight delay in effect. Hence, it is prudent to adva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fiscal revenue structure towards tax reliance, continually refining the tax structure and boosting the share of direct tax revenue in total tax revenue to enhance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and improve nation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Key Words Tax; Tax Structure; Direct Tax; Indirect Tax;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 THEORETICAL REVIEWS

From Red Tape to Effective Rules: The Evolutionary Logic of Institutional Rules Research

..... Shenghao Guo & Xue Wei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effective rules transcends the traditional framework of red tape research, and reinterprets the function of organizational ru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le attributes. This shift provides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al tools for the field of public management.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and generative logic of effective rules, distinguishing them from red tape and necessary bureaucracy to clarify their conceptual extension and highlight their unique value. Meanwhile, the paper provid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commentaries on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effective rules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empirical testing,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But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this theory are still in the early stage, with inconsistent findings and insufficient depth. Future research should deepen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effective rules, improve their research methods, and expand their research scenarios,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dministrative rules from quantitative expansion to qualitative optimization.

Key Words Effective Rules; Red Tape; Rule Attributes; Rule Design

公共行政评论

双月刊，2008年创刊
第19卷，第3期（总第111期）
2026年6月15日出版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Bimonthly, Since 2008
Vol.19 No.3
Published in June 2026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中山大学
协办单位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广东省行政管理学会

社 长 肖 滨

主 编 朱亚鹏

联系电话 020-84113029 020-84038746

电子邮件 jpachina@163.com

编辑出版 《公共行政评论》编辑部
(广州新港西路135号; 邮编510275)

印 刷 广州一龙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传 真 020-84111478

网 址 <http://jpa.sysu.edu.cn>

Administrator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ponsors Sun Yat-sen University

Supporters Centre for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ciety

President: Bin Xiao

Editor in Chief: Yapeng Zhu

Tel: 86 20 84113029 86 20 84038746

Fax: 86 20 84111478

Email: jpachina@163.com

Website: <http://jpa.sysu.edu.cn>

Edited by Editorial Office of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O.135 Xin Gang Xi Road, Guangzhou, China. 510275)

Distributed by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Corporation

(P.O.Box 399, Beijing, China)



刊号 ISSN1674-2486
CN44-1648/D

邮发 国内46-364
代号 国外BM8839

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定价: 20.00元

ISSN 1674-2486



9 771674 248265

06